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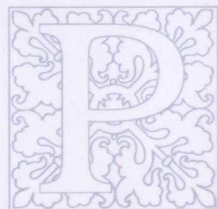
(修订版)

[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James C. Scot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修订版)

[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

王晓毅/译 胡搏/校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James C. Scot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本书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本译出

再一次永远地献给路易斯

欧文：怎么了？

约兰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关心我在其中的角色，那可以说是一种驱逐。

欧文：我们正在编制六英寸的国家地图，那上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约兰德：不是在……

欧文：我们将取消那些带来迷惑混淆的地名……

约兰德：谁迷惑了？人民迷惑了吗？

欧文：我们将那些地名标准化，使它们尽可能地准确和清楚。

约兰德：有些东西却被侵蚀了。

——布赖恩·福瑞尔 (Brian Friel), 《翻译 2.1》

中文版序言

能够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作一个简短的序言是我的荣幸，同时它的出版也使我忐忑不安。

作为一个从事政治学和人类学研究近 40 年的学者，我感到长期和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知识传统使我受益匪浅。我从中吸收了大量知识，尽管只是通过翻译的著作。这不仅包括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学术著作，而且包括中国的古典文学。我发现后者是极富启发意义的。比如，我最近发现，《水浒》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它表明在国家压迫下，人迹罕至的山地如何成为人们避难和复兴的场所。这一经验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我所研究的东南亚大陆山地与河谷之间的关系。

尽管我是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特别是从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问题研究的专家，但我最初曾计划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在我开始研究生学习的 1962 年，访问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从事研究了。那时，我非常想在村庄从事田野工作，而不想成为“扶手椅上”的图书馆学者。为此，我转而学习马来语，后来在马来西亚从事了两年的田野工作，《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New Haven, 1985）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感谢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他不仅是我的同事和教学伙伴，也是我知识上的良师，他使我能够一直与中国农村

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行，这也包括他自己 [与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和赛尔登 (Mark Selden)] 关于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著作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我也有幸培训了许多学生，他们现在出色地从事中国农村研究，并且与昆明可持续发展与地方知识研究所合作进行地方和俗语的认识。

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的泛滥提供了条件。我从科学林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城市规划 (巴西利亚)、坦桑尼亚的“村庄化” (乌贾玛)、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农业中都得了出这一结论。在每一个案例中我都指出了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之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识及其在压迫下的适应和逃避在许多时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灾难。我知道，我这里的一些结论也可以被推广到现代中国的一些时期 (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和李森科主义的农业进步时期)。我将这些工作留给我的那些有才华的中国读者。

这些项目的基石来自我所称的“清晰和简单化的设计”，这些设计是所有社会规划、图解和管理所不可或缺的。作为一种控制人口流动的知识形式的户籍制度就是一例。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早熟的，早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正式的宗族姓氏制度。在它们之中，以及它们本身，清晰和简单化活动所显现的只是抽象的“能力”。它们可以被负责和有益地使用 (比如对于追踪和控制非典型肺炎所必要的全国流行病统计数字)，也可以为了无意义的目的而被不负责任地使用。尽管我所讨论的几个例子都是以前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但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狂妄及其带来

的灾难（比如巴西利亚、科学林业、工业化农业）并非社会主义背景下独有的危险。它也同样可以是巨大并且强有力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产物，当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群体力量操纵自然和它们的人力以实现其控制范围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这部著作应被看做对我所说的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对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的赞颂。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相互密切关系”的赞颂，这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后来在一般观念中，无政府主义代表了“无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压制地方和流行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无序。

我将这部著作的出版看做一个开展与中国同事对话的机会，我期望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远比我所教授的更多。

詹姆斯·C. 斯科特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

农业研究项目主任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鸣 谢

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远远超出了我愿意承认的长度。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如果一直在透彻地思考这本书，那当然很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常开小差和所承担的管理事务凑在一起是导致延误的大部分原因。此外书的范围被扩大了，试图要覆盖我希望涉及的所有领域，这就像是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的学院版。最后，这本书就像是我一生的工作一样，我不得不经常随机地停下或者开始思考。

因为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很广，写作时间又很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知识上的帮助。要列举所有这些帮助将是很冗长的，而且我也知道，许多提供帮助的人并不认同这一最终成果。因此尽管我很感谢他们，但并不会将他们在这里列举。我并非沿着他们所推动的方向进行我的争论，而是在坚持我自己意见的时候将他们的批评记在心上，从而可以更好地回答他们的反对意见。另外一些提供帮助的人没有预先表示不同意我的最终成果，我将在此列举他们，并希望包含了他们的意见。

我还要感谢一些机构。1990 ~ 1991 学术年中，我在柏林的高级应用科学研究所（Wissenschaftskolleg）受到了他们友好和慷慨的接待。那正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一年，在柏林住一段时间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在东德梅克兰伯格平原的一个前集体农庄劳动六个

星期以后（如果不去农庄，那么另外的选择是与那些长满青春痘的青少年在歌德研究所的课堂上坐六个星期，这是我最不希望的），我将自己投入到德国的语言、柏林和德国的同事中。从任何正式的意义说，我的研究基本没有进展，但是我知道许多富有成果的探索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沃尔夫·勒泼尼斯（Wolf Lepenies）、莱茵哈德·普拉色（Reinhard Prasser）、卓赤木·尼特来贝克（Joachim Nettlebeck）、芭芭拉·桑德斯（Barbara Sanders）、芭芭拉·高尔夫（Barbara Golf）、克里斯汀·克劳恩（Christine Klohn）与杰哈特·李德尔（Gerhard Riedel），他们非常友好。我在当地的守护神乔治·艾尔沃特（Georg Elwert），以及沙里尼·兰德里亚（Shalini Randeria）、伽博·克拉尼泽（Gabor Klaniczay）、克里斯托夫·哈博斯梅尔（Christoph Harbsmeier）、芭芭拉·雷恩（Barbara Lane）、米切尔·阿什（Mitchell Ash）、胡安·林兹（Juan Linz）、卓辰·布拉什克（Jochen Blaschke）、亚瑟·冯·米仁（Arthur von Mehren）、阿吉姆·冯·欧本（Akim von Oppen）、汉斯·路德（Hans Luther）、卡罗拉·兰茨（Carola Lenz）、杰尔德·斯皮特勒（Gerd Spittler）、汉斯·麦迪克（Hans Medick）以及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ke），他们在知识上的友好帮助使我睁开了探索的眼睛，这些探索是很有意义的。正因为有了海因兹·勒赫赖特（Heinz Lechleiter）和乌尔苏拉·赫斯（Ursula Hess）的艰苦努力和不变的友谊才使我的德语达到勉强可以忍受的程度。

在繁忙地为此书准备的不同阶段，我得到了访问许多机构的机会，在这些机构中有许多富有勇气、充满怀疑精神的同事。非常幸运的是，他们经常以纠正我的想法为己任。虽然他们可能并不满意我的最终成果，但是我肯定他们可以从此书中看到他们的影响。在法国马赛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Marseille），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资助人吉恩-皮埃尔·奥立维亚·德·萨丹（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托马斯·

皮尔申科 (Thomas Bierschenk) 以及他们同人会议的同事。居住在老箩筐街 (Le Vieux Panier), 每天在老仁爱会 (La Vielle Charité) 的宏伟气氛中工作, 这种经历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 我得到了一批无可匹敌的人文学者和亚洲问题专家的密切关照。我特别感谢中心主任葛瑞姆·克拉克 (Graeme Clark) 和副主任艾恩·麦克卡尔门 (Iain McCalman) 的邀请; 还要感谢汤尼·雷德 (Tony Reid) 与戴维·凯立 (David Kelly), 他们发起组织了“亚洲的自由观念”研讨会, 这次会议使我有机会访问这里。此外我还要感谢汤尼·米尔纳 (Tony Milner) 和克莱尔·米尔纳 (Claire Milner)、拉纳吉特·古哈 (Ranjit Guha) (我的导师) 和麦克泰尔德·古哈 (Mechthild Guha)、鲍勃·古丁 (Bob Goodin) 和戴安娜·吉布森 (Diane Gibson)、本·特里阿·科尔科夫雷特 (Ben Tria Kerkvliet) 和梅林达·特里阿 (Melinda Tria)、比尔·詹纳 (Bill Jenner)、伊恩·威尔逊 (Ian Wilson) 和约翰·沃克 (John Walker), 他们通过各种方法使我在那里感到快乐, 并得到知识上的回报。

如果不是狄克·欧曼 (Dick Ohmann) 和贝特西·特拉勃 (Betsy Traube) 邀请我于 1994 ~ 1995 学术年到卫斯理大学 (Wesleyan University) 的人文中心做一年的访问学者, 我这本书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里的同事和每周的讨论会都在知识上给我以支持,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贝特西·特拉勃组织论文的出色能力。偏僻的地理位置, 再加上它热心的职员, 使这个中心成为我完成整个手稿第一稿的最佳地方。我非常感谢帕特·卡姆登 (Pat Camden) 和杰姬·李奇 (Jackie Rich) 不间断的友好支持。贝特西·特拉勃和卡奇·托罗兰 (Khachig Tololyan) 敏锐的洞察力在这部著作中留下了很多印记。此外, 我还要感谢比尔·库恩 (Bill Cohen)、彼得·鲁特兰德 (Peter Rutland) 和朱迪斯·格登斯坦 (Judith Goldstein)。

如果没有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 (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 (研究理解和减少暴力、侵略和统治) 以及约翰·D. 和卡瑟琳·T. 麦克阿瑟基金会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的和平与安全项目资助, 我也不可能在 1994 ~ 1995 年有闲暇来思考和写作。他们对我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使我从行政和教学的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 如果没有这些, 我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荷兰以及在阿姆斯特丹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同事。感谢他们给我参加第六次 W. F. 威尔泰姆 (W. F. Wertheim) 讲座的机会, 这些同事包括: 杰·布莱门 (Jan Breman)、布莱姆·德·斯瓦恩 (Bram de Swaan)、汉斯·索纳维尔德 (Hans Sonneveld)、奥托·范·登·缪森伯格 (Otto van den Muijzenberg)、安托·布洛克 (Anton Blok)、罗德·阿亚 (Rod Aya)、罗莎娜·鲁坦 (Roseanne Rutten)、卓翰·高德斯布鲁默 (Johan Goudsblom)、杰-威廉·杜凡达克 (Jan-Willem Duyvendak)、艾多·德·翰 (Ido de Haan)、卓翰·海布伦 (Johan Heilbron)、卓斯·考门 (Jose Kommen)、卡琳·皮泼卡姆 (Karin Peperkamp)、尼尔斯·穆尔德 (Niels Mulder)、弗兰斯·休斯肯 (Frans Hüsken)、本·怀特 (Ben White)、杰·尼德维·皮特斯 (Jan Nederveen Pieterse)、弗兰茨·冯·本达-贝克曼 (Franz von Benda-Beckmann) 和吉卜特·冯·本达-贝克曼 (Keebet von Benda-Beckmann)。我在那里的特权之一是能接受威姆·威尔泰姆 (Wim Wertheim) 的建议和批评。我非常尊敬他在社会科学理论和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诸多贡献。在我的研讨会上, 我从那些写论文的研究生那里学到的至少与他们向我学到的一样多; 塔尔加·波特斯 (Talja Potters) 和皮尔·斯密兹 (Peer Smets) 非常友好地阅读了我关于城市计划的一章, 并提出了很有意义的批评。

还有许多学者的著作打开了我的眼界, 从新的角度对问题提出了出色的分析, 而我自己不可能做如此综合的研究。有些人还没有看到这本书, 有些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还有一些人很可能不想承认

我所写的东西。然而，我还是要冒昧地将我的感谢献给下面这些人：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本·安德森（Ben Anderson）、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特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詹姆斯·福格森（James Ferguson）和兹格曼特·鲍曼（Zygmunt Bauman）。如果没有詹姆斯·霍尔斯顿（James Holston）富有洞察力的关于巴西利亚的著作，我只能很惭愧地说，我不可能写出关于极端现代主义城市的那一章。关于俄罗斯集体农庄以及与美国工业化农业关联的那一章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希拉·菲兹帕特克（Sheila Fitzpatrick）和德布拉·菲兹杰拉德（Deborah Fitzgerald）。我要感谢希拉·菲兹帕特克透彻的评论，尽管他的评论只有几项被充分反映在本书中。

我要感谢马舍·迪特恩（Marcel Detienne）和吉恩-皮埃尔·弗南特（Jean-Pierre Vernant）帮助我弄清了米提斯（*mētis*）的概念。尽管我们彼此互不相识，所用的术语不同，学术背景不同，但史蒂芬·玛格林（Stephen Marglin）和我走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支持，玛格林在意大利的贝拉吉奥（Bellagio）组织了“经济学绿色化”（The Greening of Economics）的研讨会，在那个会上我第一次公开了我最初的想法。玛格林关于认识论（*episteme*）和技术（*techne*）的著作以及他关于农业的著作对我有很大影响。史蒂芬·古德曼（Stephen Gudeman）深入的评论，弗雷德里克·阿帕法尔·玛格林（Frédérique Apffel Marglin）关于“种痘”（*variolation*）的著作，以及阿伦·阿格瓦尔（Arun Agrawal）的著作和注释都使我增强了对实践知识的认识。关于农业的第八章通篇都打上了我所学习的保罗·里查兹（Paul Richards）和杰·多威·范·德·普乐伊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著作的印记。我只是一个业余的非洲学者，关于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的部分要特别感谢乔尔·高·西萨（Joel Gao Hiza），他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写出了非常出色的本科论文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丰富的资料（现在他正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他的人类学论文)。布鲁斯·麦克金 (Bruce McKim)、让·阿敏扎德 (Ron Aminzade)、戈兰·海登 (Goran Hyden)、戴维·斯伯苓 (David Sperling) 和阿伦·伊萨克曼 (Allen Isaacman) 阅读了关于坦桑尼亚的章节, 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 毫无疑问, 尽管经过了他们的努力, 也还会有一些错误没有发现。博吉特·穆勒 (Birgit Müller) 关于德国统一之前东德工厂经济中“修理工和商贩”角色的精辟分析帮助我理解了有计划的命令和非正式安排之间的共生关系。

拉瑞·劳曼 (Larry Lohmann) 和詹姆斯·福格森阅读了早期的手稿并给出许多建议, 这使我的思想更加清晰, 并避免走许多弯路。尽管这部书稿很长, 一些好朋友们仍主动要求阅读全部或部分手稿。我没有麻烦那些在提出要求时转动眼睛, 或者用身体语言表达很复杂感情的人。那几个真正想读这本书的人, 或者只是假装喜欢这本书但成功地使我确信不疑的人都给予了很多评论, 并对本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要衷心感谢下列这些人, 他们给我很多帮助: 让·哈令 (Ron Herring)、拉玛山德拉·古哈 (Ramachandra Guha)、兹格曼特·鲍曼、K. 斯瓦拉玛克里什南 (K. Sivaramakrishnan)、马克·莱德 (Mark Lendler)、阿兰·伊萨克曼 (Allan Isaacman) 和彼得·万德吉斯特 (Peter Vandergeest)。

许多有思想的同事为我提出了很有用的批评或推荐给我一些著作, 这些都有助于完善我的论点和论据。他们包括阿君·阿帕度来 (Arjun Appadurai)、肯·阿尔德 (Ken Alder)、格利戈瑞·卡扎 (Gregory Kasza)、丹尼尔·戈德哈根 (Daniel Goldhagen)、埃利希·戈德哈根 (Erich Goldhagen)、彼得·帕度 (Peter Perdue)、埃舍·津斯顿-曼 (Esther Kingston-Mann)、彼得·萨林斯 (Peter Sahlins)、安娜·瑟琳尼 (Anna Selenyi)、多戈·加伦 (Doug Gallon) 和简·曼斯布里奇 (Jane Mansbridge)。我还要感谢叔伽塔·博斯 (Sugata Bose)、埃尔·麦克考 (Al McCoy)、理查德·兰德斯 (Richard Landes)、戈罗利亚·拉赫加 (Gloria Raheja)、吉

任·阿吉兹·乔德里 (Kiren Aziz Chaudhry)、杰斯·吉尔伯特 (Jess Gilbert)、通柴·韦尼察库 (Tongchai Winichakul)、丹·克利合 (Dan Kelliher)、丹·利特尔 (Dan Little)、杰克·克劳本伯格 (Jack Kloppenberg)、汤尼·古里尔米 (Tony Gulielmi)、罗伯特·埃文森 (Robert Evenson) 和彼得·萨林斯。其他还有许多做出贡献的人, 包括亚当·阿什福斯 (Adam Ashforth)、约翰·特兰尼恩 (John Tehranian)、迈克尔·科瓦斯 (Michael Kwass)、杰斯·李伯特 (Jesse Ribot)、埃兹拉·舒莱曼 (Ezra Suleiman)、吉姆·博伊斯 (Jim Boyce)、杰弗·博德斯 (Jeff Burds)、弗莱德·库博尔 (Fred Cooper)、安·斯托勒 (Ann Stoler)、阿图尔·考利 (Atul Kohli)、奥兰多·费格斯 (Orlando Figes)、安娜·秦 (Anna Tsing)、弗农·鲁坦 (Vernon Ruttan)、亨利·伯恩斯坦 (Henry Bernstein)、米歇尔·瓦特斯 (Michael Watts)、阿兰·普里德 (Allan Pred)、维通·婆姆庞萨哈洛伊 (Witoon Permpongsacharoen)、吉尼·阿玛瑞尔 (Gene Ammarell) 和戴维·菲尼 (David Feeny)。

过去的五年中, 耶鲁大学农业研究项目给了我广泛的、跨学科的有关农村生活的教育, 同时也是我首要的精神和知识伴侣。这个项目给予我的远远超出我所能回报的。事实上, 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可以追溯到在这个项目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我不能列举每年来访的差不多 50 名博士后, 但是他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对这本书作出了贡献。我们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项目是因为我们尊重他们的工作, 他们也从没有让我们失望。农业研究项目的主任马沃尔·凯·曼斯菲尔德 (Marvel Kay Mansfield) 是这个项目成功的核心和灵魂, 也是我在耶鲁合作的所有项目的核心和灵魂。我在其他一些场合也表达过我对她的感谢, 但是随着时间增加, 我的感谢也在增加。如果没有 K. 斯瓦拉玛克里什南、里克·莱因甘斯 (Rick Rheingans)、多纳·佩瑞 (Donna Perry)、布鲁斯·麦克金、尼娜·巴特 (Nina Bhatt) 和琳达·李 (Linda Lee) 的首创工作, 农业研究项目也不

会如此兴旺。

耶鲁的同事给我的帮助很难列举清楚。那些我曾教过的学生：比尔·凯利 (Bill Kelly)、海伦·苏 (Helen Siu)、鲍勃·哈姆斯 (Bob Harms)、安格利克·豪格鲁德 (Angelique Haugerud)、南希·佩鲁索 (Nancy Peluso)、约翰·瓦格 (John Wargo)、凯茜·科恩 (Cathy Cohen) 和李·万德尔 (Lee Wandel)，事实上也在很多方面教育了我。在这部著作中还可以发现耶鲁其他一些同事的印记，包括伊恩·夏皮罗 (Ian Shapiro)、约翰·梅瑞曼 (John Merriman)、哈尔·康克林 (Hal Conklin)、保尔·兰岛 (Paul Landau)、恩里克·梅尔 (Enrique Meyer)、迪米西·古塔斯 (Dimitri Gutas)、卡罗尔·罗斯 (Carol Rose)、本·凯尔南 (Ben Kiernan)、乔·艾灵顿 (Joe Errington)、查尔斯·布莱恩特 (Charles Bryant)，还有阿韦德·尼尔森 (Arvid Nelson)，作为访问学者，他正在完成有关东德林业的论文，这是关于德国科学林业历史的最出色的信息来源。在我的“无政府主义”讨论班上，以及合作的“农业社会比较研究”的讨论班上，研究生们阅读了手稿的许多章节，并将它们拆开打乱，使我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问题。

我有幸得到几位杰出的研究助手，他们将散乱的、漫无头绪的东西变成严肃的探索。如果没有他们的想象力和工作，我根本不知道永久姓氏的发明、新村庄的空间布局和语言的规划。这里我有机会来感谢他们出色的工作，他们是：凯特·施丹顿 (Kate Stanton)、卡桑德拉·莫斯雷 (Cassandra Moseley)、美瑞蒂斯·维斯 (Meredith Weiss)、约翰·特兰尼恩、阿兰·卡尔森 (Allan Carlson)。在这里我不仅仅要感谢卡桑德拉·莫斯雷，还要表示我的歉意，为了使本书篇幅不会太大，我忍痛将她关于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很出色的一章删掉了。我坚信它可以在其他地方发表。

耶鲁大学出版社在很多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我想特别感谢约翰·雷登 (John Ryden)、朱迪·梅特 (Judy Metro) 以及我的编辑查尔斯·格里奇 (Charles Grench)，还有我所遇见的最好的手稿编

辑布兰达·科尔波 (Brenda Kolb)。

第一章与后面不同章节的材料曾在许多不同地方出现过，如《国家简单化：自然、空间和人民》，加拿大萨斯凯赤万大学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历史系阶段论文 1 号，1994 年 11 月；《国家简单化》，《政治哲学杂志》第 4 卷第 2 期 (1995)：1~42；《国家简单化：自然、空间和人民》，伊恩·夏皮罗和罗素·哈丁 (Russell Hardin) 主编的《政治秩序》，《规范》(Nomos) 38 卷 (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6)：42~85；《自由与自由的保有：东南亚的国家简单化，空间与人民》，戴维·凯利和安东尼·雷德主编的《亚洲的自由》(即将出版)；《国家简单化：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应用》，亚洲研究中心第六次 W. F. 威尔泰姆讲座，阿姆斯特丹，1995 年 6 月；还有《国家简单化与实践知识》，史蒂芬·马格林和史蒂芬·古德曼主编的《人民的经济，人民的生态》(即将出版)。

我希望踢开写书的习惯，至少有一段时间这样。如果有类似戒毒所或戒烟片一样可以治愈写书瘾的地方，我一定会接受治疗。我的习惯已经花费了我许多宝贵时间。写书和其他的瘾一样，戒除的时候很伟大，但是当痛苦的状况缓解，渴望又会迅速回来。我知道，只有当我彻底戒除写书瘾的时候，路易斯 (Louise) 和我的孩子们——米阿 (Mia)、阿伦 (Aaron) 和诺亚 (Noah) 才会高兴。我在努力，天知道我在努力。